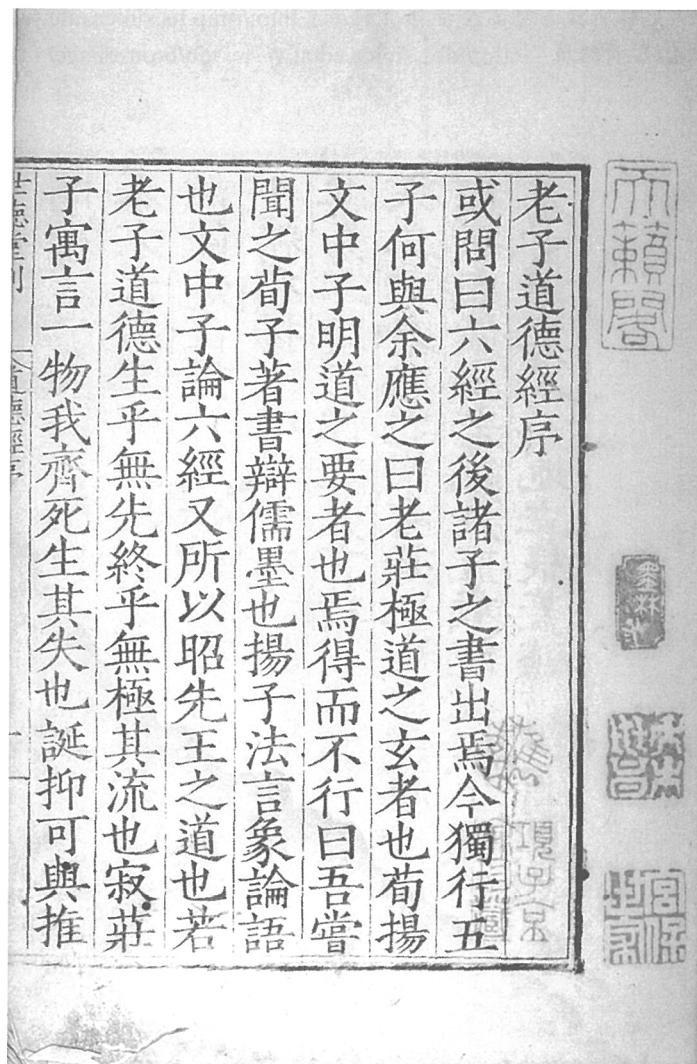


## 傅圖收藏的「項子京舊藏」古籍



明刻本《六子全書》

李宗焜  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

項子京生於嘉靖四年，卒於萬曆十八年（1525-1590），是明末的大收藏家，所居曰天籟閣，收藏的書畫、古籍，量多質精，冠絕一時。舉其大者，法書名蹟如：王羲之〈平安、何如、奉橘〉三帖、〈遠宦帖〉，以及「行書之龍」〈蘭亭敘〉的馮承素、褚遂良摹本；又如懷素〈自敘帖〉、米芾〈蜀素帖〉、蘇軾〈赤壁賦〉、黃庭堅〈松風閣詩〉等。名畫如：顧愷之〈女史箴圖〉、武元直〈赤壁賦〉、趙孟頫〈鵠華秋色〉、吳鎮〈墨竹譜〉等等，①這些震爍古今的名蹟，都曾是天籟閣的藏品。除了書畫名品外，天籟閣也收藏了為數頗豐的古籍善本，如後來歸於士禮居的宋刻《陶淵明集》，即曾是天籟閣插架之物。其收藏之富，水準之高，令人讚嘆！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（以下簡稱「傅圖」）收藏的善本古籍中，也有四部鈐有項氏收藏印，本文將介紹這位大收藏家，同時討論傅圖收藏的這四部「項氏舊藏」，並把重點放在鈐蓋的印記。

## 一、項子京其人

項子京雖是極富盛名的大收藏家，但《明史》中完全沒有他的資料，只有《清史稿》提到他的孫子：

項聖謨，字孔彰，嘉興人，元汴之孫。初學文徵明，後益進於古，董其昌稱其與宋人血戰，又得元人氣韻。②

至於元汴何人，則隻字未提。《嘉興府志》云：

項元汴，字子京。博雅好古，不習舉業。萬曆間被徵不起席。豪貲，天下法書、名畫、鼎彝、玉石諸珍祕，不脛而至。獲古琴，有「天籟」字，遂以顏其儲藏之閣。辨別真贗，析及苗髮。……同時婁東王世貞，蒐羅名品亦不遺餘力，然不逮遠甚。嘉、隆以還，宇內稱鑒賞家第一。每以私印鈐書畫，纍纍滿幅；或識其價若干於尾。……二百年來，天籟閣所藏流散人間，往往採入內廷，履荷天章題其遺蹟，實異代稀覩之榮也。③

對項子京的生平有較詳細的鉤述。④朱彝尊在項子京的哥哥項篤壽收藏的〈萬歲通天帖〉題跋中也說：

①以上所舉，除〈蘭亭敘〉兩種摹本在北京故宮，〈女史箴圖〉現藏大英博物館外，其餘均在台北故宮。

②新校本《清史稿》卷五百四，列傳二百九十一，藝術三。13908頁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。

③《嘉興府志》卷五十三，秀水文苑傳。清·許瑤光修，吳仰賢等纂。清光緒三年(1877)至四年(1878)鶯湖書院刊，光緒五年(1879)重印本。

④承審查人見示，項氏生平另見於朱謀重《續書史會要》、姜紹書《無聲詩史》（均見《明代傳記叢刊》72冊）、徐沁《明畫錄》卷四等，作者十分感謝。這些生平資料內容大同小異，茲不具引。另董其昌〈項元汴墓誌銘〉亦可參。

子長諱篤壽，……好藏書，見祕冊輒令小胥傳鈔，儲之舍北萬卷樓。其季弟子京以善治生產富，能鑒別古人書畫、金石、文玩物，所居天籟閣，坐質庫估價，海內珍異十九多歸之。<sup>⑤</sup>

富厚的經濟能力，為項子京的收藏提供了有利的條件。上門求售者自然「不脛而至」，如《珊瑚網》載：

宋高宗手書〈龍王敕〉，向在龍淵寺，寺僧信源質子京處。子昂〈亭林碑〉真跡，曾黏村民屋壁上，王野賓得之，以售項氏。<sup>⑥</sup>

項子京的收藏還得力於虛心求教。錢遵王曾說：

我聞墨林項氏，每遇宋刻，即邀文氏二承鑒別之，故藏書皆精妙絕倫，虛心諮詢，此又今人之師也。今人奈何不師之。<sup>⑦</sup>

項子京與文徵明家素有交情，故文氏二子文彭（字壽承，號三橋，後世尊為「印祖」）、文嘉（字休承，號文水，繪畫得文徵明的真傳），就成了項氏收藏書畫、古籍善本的「學術顧問」了。後世介紹天籟閣藏書的論述中，引用錢氏此文的極多，但多止於項氏收藏的「精妙絕倫」，而忽略了他的「虛心諮詢」。正因為「虛心諮詢」，才造就了「精妙絕倫」。

當然，要有「精妙絕倫」的收藏，光靠「虛心諮詢」的「眼力」是絕對不夠的，雄厚的「財力」做後盾更不可少。張大千曾形容金錢為「雅根」，在收藏的世界裡，再印證這樣一個事實：錢不是萬能，沒有錢是萬萬不能。項氏的收藏當然也不例外。

對這樣一位有錢的大收藏家，負面的評價也是有的，如說他「嗜於財」，<sup>⑧</sup>這似乎是多數有錢人的通病，也就不足為病了。另一個較受非議的是關於鈐蓋收藏印的問題。前引《嘉興府志》的內容，大都見於姜紹書《韻石齋筆談》，只是《嘉興府志》但述事實，《韻石齋筆談》則頗有微詞。如說項子京：

每得名蹟，以印鈐之，纍纍滿幅，亦是書畫一厄。譬如石衛尉，以明珠精鏐，聘得麗人，而虞其他適，則黥面記之，抑且遍黥其體，使無完膚，較蒙不潔之西子，更為酷烈矣。復載其價于楮尾，以示後人，而與賈豎甲乙帳簿何異？不過欲子孫長守，縱或求售，亦期照原直而請益焉，貽謀亦既周矣。乙酉歲，大兵至嘉禾，項氏累世之藏，盡為千夫長汪六水所掠，蕩然無遺，詎非枉作千年計乎？物之尤者，應如煙雲過眼觀可也。<sup>⑨</sup>

<sup>⑤</sup>朱彝尊〈書萬歲通天帖舊事〉，《曝書亭集》卷53，原刊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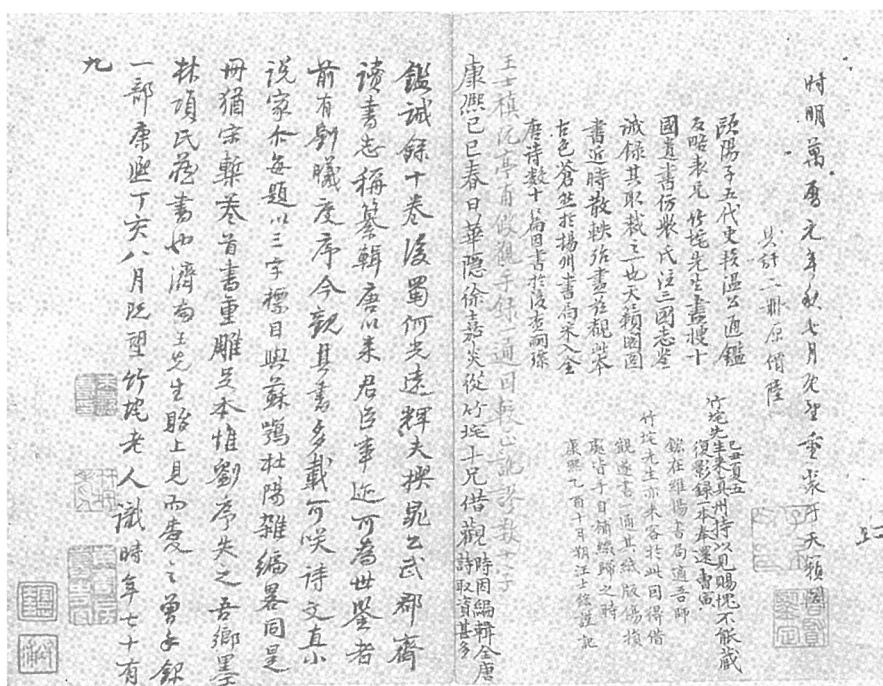
<sup>⑥</sup>見明·汪珂玉《珊瑚網·書錄》卷二十二，578-579頁。成都古籍書店，1985.9。項元汴的收藏另可參考鄭銀淑《項元汴之書畫收藏與藝術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4）等。承審查人見告相關論著，謹致謝忱。

<sup>⑦</sup>《讀書敏求記》卷四，詩文評，劉勰《文心雕龍》條。《叢書集成新編》第二冊，567頁。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5。

<sup>⑧</sup>同註5。

<sup>⑨</sup>《韻石齋筆談》卷下「項墨林收藏」條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《叢書集成初編》，民國26年6月。

從「聚散容易」、「過眼雲煙」的角度看，這些說法固然不錯；但從收藏者的心情看，姜氏的說法就不免隔靴搔癢了。絕大多數的收藏家都希望「子孫永保」，但事實則是「別時容易」，雖則如此，收藏家那種玩物喪志的傻勁不會退燒，如果都懷抱身外之物的思想，就不可能「物常聚於所好」了。因此，絕不能用超然物外的哲思，去衡量收藏者的心態。項氏累世之藏，雖然盡為人所掠奪，但藏家的收藏或毀於兵災，或毀於水火者時有所聞，而其前仆後繼的精神，實在令人感佩，更不必譏以「枉作千年計」。從各種記載看，項氏富於收藏為世所稱，但他「購求」之外，似少見「倒賣」的記錄，<sup>⑩</sup>其心性或「嗜於財」，但收藏的主要目的似不在於賺價差套利，姜氏之言似乎有些想當然耳。即使「請益求售」，也是買賣之間的人之常情，亦不足致譏。項氏除「載其價於楮尾」外，對所收藏的古籍，有時還會加以整理重裝，如後來遞經黃丕烈、翁同龢等收藏的宋刻巾箱本蝴蝶裝《重雕足本鑑誠錄》，項氏收藏時即在卷尾題了「時明萬曆元年秋七月既望，重裝于天籟閣。共計二冊，原價陸。」<sup>⑪</sup>「重裝」的目的，也不見得是為了讓書更具賣相！此外，「載其價於楮尾」也有助於我們了解當時的「行情」，如神龍半印本〈蘭亭敘〉，<sup>⑫</sup>項氏記曰「原價伍百伍拾金」，相較於「原價陸」的宋版《鑑誠錄》何啻霄壤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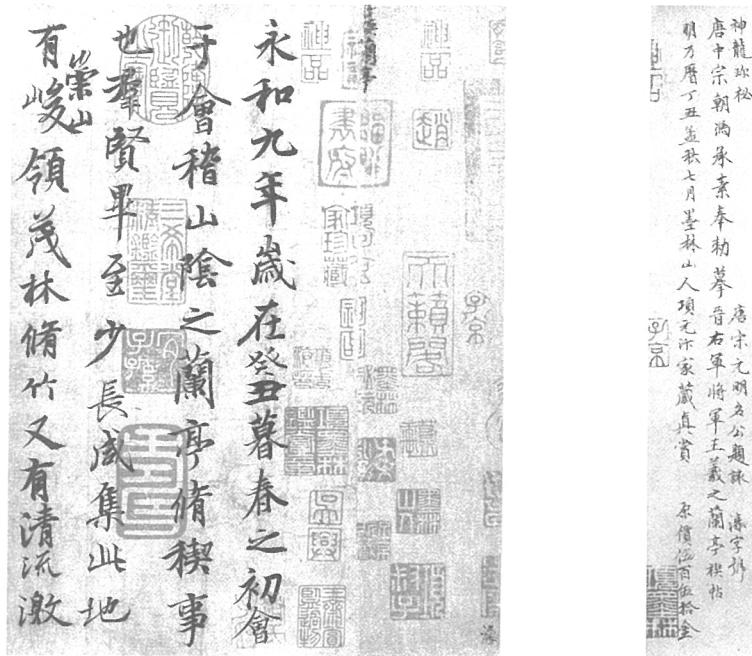


《鑑誠錄》題跋

<sup>⑩</sup> 〈書萬歲通天帖舊事〉中提到，項子京買到貴的東西，心情就非常不好，最後都是哥哥照原價買走。以此而言，項子京最多只是不吃虧，似乎沒有賺。

<sup>⑪</sup> 見《常熟翁氏藏書圖錄》第45種，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發行，2000年。

<sup>⑫</sup> 〈蘭亭敘〉馮承素摹本，《原色法帖選》36。日本東京二玄社出版，1990。



項子京收藏的蘭亭敘及其題跋

在藏品上鈐蓋收藏印記，幾乎是藏家必做的事，這些收藏印記，為藏品的流傳統緒提供有利的線索，精美的收藏印本身，有時也是可供欣賞的另一項藝術。項氏的鈐印本來無可厚非，但「纍纍滿幅」，確實有礙觀瞻。葉昌熾有詩：

十斛明珠聘麗人，為防奔月替文身。

紫茄白莧秋風裡，一度題詩一愴神。<sup>⑬</sup>

也是對項氏蓋印的不以為然。然而項氏尚知把印蓋在卷首楮尾，或畫幅下端空白處，尚不甚損害畫面。後來乾隆皇帝常在書畫作品顯要處「纍纍滿幅」的蓋印，甚至在畫幅上端中央處蓋上極其礙眼的大印，不知是不是受了項氏的「啟發」而變本加厲？

以個人看書讀畫所見，項氏的用印除了「纍纍滿幅」的毛病外，蓋得不好是另一個重大缺失。以鈐蓋收藏印而言，其印泥濃淡、施力輕重等都有許多講究，蓋得清楚則是最起碼的要求。項氏收藏印，似乎連這個起碼要求都沒做到。項氏收藏極豐富，再加上「纍纍滿幅」的蓋印，卻很難找到幾個蓋得好的，跟同幅其他藏家的印記比起來，明顯遜色很多。項氏與文彭敦交，後世據以推定其收藏印出文彭之手，印章的水準應是相當高的，但蓋出來的品質卻並不理想，蓋得多又蓋得差，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。

⑬《藏書紀事詩》卷三。《叢書集成新編》第101冊，779頁。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5。

項子京既是收藏書畫、古籍的赫赫名家，假借他的名義以牟取不當利益的事，自然也就應運而生，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偽造收藏印。尤其項子京並沒有像其他藏家一樣有所謂「藏品目錄」，更讓作偽者毫無顧忌。如有「藏品目錄」，作偽者至少要找目錄中的「複本」下手，這樣就大大的壓縮了作偽的空間。一但沒有目錄可資接查，似乎只要偽造一個印章，就能夠「無施而不可」，以致偽刻的項氏收藏印橫行天下。

## 二、古籍之偽

大凡書畫、古籍等一切古玩珍稀，只要有利可圖，作偽便隨之而來。古籍的作偽，主要有幾種：

(一) 偽託：不知名的作者想要宣揚自己的見解，又感於人微言輕，於是假借古人名義以推銷自己的主張。如許多古書的作者託言孔子，便是最明顯的例子。很多文章中的「子曰」，其實就是作者自己的話。這種做法，固然假借古人名義，但主要是為了加重自己見解的「份量」，與經濟利益並沒有直接關係。除此之外，幾乎所有的偽作，都是以獲取暴利為出發點的。

(二) 版本作偽：古籍版本的珍貴程度，往往與時代的遠近有關。主要不是因為時代久遠具有古董價值，而是時代愈遠的版本去古愈近，傳鈔致誤的機會愈小，所以愈可貴。從學術的價值而言是版本可貴，從經濟角度看，則反映出價格的昂貴。因此，以時代較晚的版本冒充時代較早的版本，在古籍流通的市場上，是司空見慣的現象。如：以元本充宋本，或以明本充宋元本，或以翻刻本充原刻本等等。此外還有以「殘本」冒充「足本」，也是為了獲取暴利。其作偽的手段很多，如竄改書的牌記、序跋等。這些作偽的手段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拿低價的東西冒充高價的，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不當利益。

(三) 印記的作偽：印記的作偽又可分為二種情形：

(1) 圖書版本沒有問題，但為了賣出更高的價錢，偽刻藏家的印記試圖「錦上添花」。同樣版本的書，如果曾被名家收藏，必然身價百倍，因為名家印記不只代表收藏記錄而已，同時也代表經過名家鑑定認可，多少增加了買者的信心；在這樣的背景和心理因素下，有了名家印記就容易賣出高價。所以「名家印記」就成了作偽者相中的目標，也是辨偽者應該注意的重點。

(2) 有些品質低劣的版本或翻刻本，本來價值就低，只好偽刻名家的印記，藉以抬高身價。或者某些劣質的抄本，冒稱名家稿本；或從書中抄寫若干篇章，冒稱古書的手抄本。這些抄手的抄本價值自然甚低，作偽者往往偽刻藏書名家的收藏印，企圖魚目混珠，藉以牟利，這種情形則不論版本或印記，都毫無價值可言。

偽造的名家印記，除了作偽者據以牟利外，對圖書本身的價值，可說沒有任何影響，我們在讀一本書或引用一本書時，並不會因為這本書曾為某人收藏而增損其價值。但對研究版本源流，卻會造成一定的困擾，因此，對收藏印記自須格外小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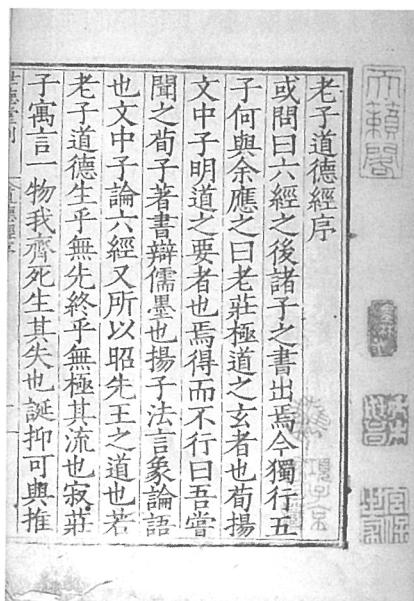
### 三、傅圖藏本

傅斯年圖書館收藏古籍善本甚多，其中蓋有項子京收藏印記的就有四部，茲分別述之。

#### (一) 六子全書

六十卷，明·顧春編。嘉靖9-12年（1530-1533）吳郡顧氏世德堂刊本，版框19.3×14.2cm，八行，行十七字。夾註雙行字數同。雙欄，版心白口，單魚尾，上方記「世德堂刊」。六子者：老子、莊子、列子、荀子、法言、文中子。是書收藏印記有：天籟閣、墨林子、子孫世昌、構李、宮保世家、項子京家珍藏、項墨林鑑賞章、子孫永保、項元汴印、子京父印、項墨林父祕笈之印、墨林山人、項叔子、子京等印。

本書諸印記皆真，確為項氏天籟閣舊藏。



明刻本《六子全書》書影

## (二) 玉堂類稿

十卷，宋·周必大（1126-1206）撰。明藍格鈔本，21.2×15.4cm。卷末署「嘉靖丙戌（1526）夏五月望，雅宜山人王寵書於石湖草堂」。王寵（1494-1533）字履仁，一字履吉，號雅宜山人，江蘇長洲人，是明代著名書家，與文徵明時相往來，文徵明〈王履吉墓志銘〉說：

君於書無所不窺，而尤詳於群經，手寫經書皆一再過。……少學於蔡羽先生，居洞庭三年；繼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。<sup>14</sup>

王寵雖然只活了40歲，但在書法上有很高的造詣。本稿是王寵33歲居石湖時所抄的。

王寵長於項子京31歲，從本書的收藏印記觀察，項子京應即本書的第一個收藏者，其後迭經傅山（1607-1684）、張照（1691-1745）、萬上遴（1739-1813）、梁同書（1740-1815）、董誥（1740-1818）等人的收藏，這些人在書法上都有一定的成就，尤其傅山、梁同書、更是赫赫名家。此書後來歸鄧邦述群碧樓，民國十六年，群碧樓部份藏品經蔡元培介紹，以五萬元賣給中央研究院，本書即為其中之一。<sup>15</sup>

《玉堂類稿》是周必大《文忠集》200卷的卷101至120。王寵喜歡抄書，此為其抄寫的一部份。《文忠集》中的《玉堂類稿》有20卷，傅圖藏王寵鈔本只有前面的10卷。以此10卷相較於四庫全書本《文忠集》（底本為浙江鮑士恭家藏本）略無差別，而與清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歐陽榮瀛塘別墅刊·咸豐元年（1851）續刊本《周益國文忠公集》<sup>16</sup>序次上有較大差異。應是清刻本在刊印時做了某種程度的改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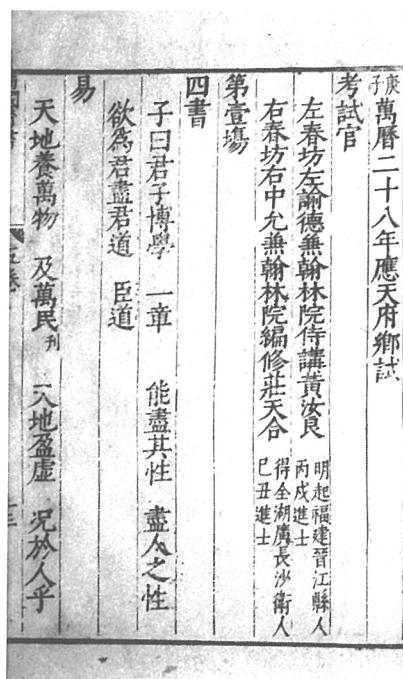
鈔本《玉堂類稿》書影

<sup>14</sup> 《文徵明集》卷31，p.713-715。周道振輯校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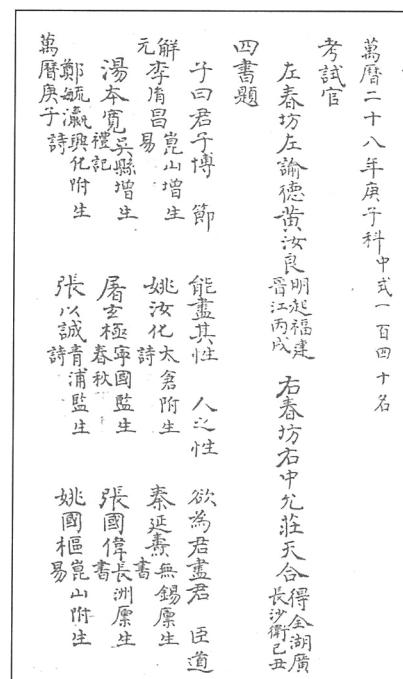
<sup>15</sup> 參考鄭偉章、李萬健《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》，〈鄧邦述與群碧樓〉，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6.9。

<sup>16</sup> 《新編叢書集成》三編第47冊，借傅圖藏本影印。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9。

### (三) 南國賢書



明刻本《南國賢書》



《南國賢書》鈔本

32

五卷，明·張朝瑞編，萬曆28年（1600）河州張朝瑞應天府刻本。框21.7×14.5cm。

本書是明憲宗成化十年至明神宗萬曆28年（1474-1600）應天府鄉試的考官名銜、考題和中舉名單。書末有萬曆28年徐申寫的後序。全書共八冊，單數冊的扉頁都有三個收藏印，<sup>17</sup>由上到下的順序分別是「檇李人」、「墨林秘玩」、「項子京家珍藏」（即下文所附的圖B、D、F）。

這三個收藏印的「印文」雖似指出為項子京舊藏，但細究其實，則大謬不然。

首先，本書刻於萬曆二十八年（1600），而項子京已先於萬曆十八年（1590）故世，此書是在項子京故世十年後才刊刻，自不可能為項氏收藏。雖似仍可勉強解釋為項氏後人蓋上去的，但這三方印與項氏的收藏印存在著明顯的區別，細加分辨，可知此三印實為偽刻。

<sup>17</sup>疑原先只有四冊，不知何時被分裝成八冊，才會出現雙數冊都沒有圖章的情形。當然分裝的時間在此三印之後。



圖A：「構李」



圖B：「構李人」

第一個圓形印，圖B的「構李人」顯然是根據圖A偽刻，而又自作聰明加上一個「人」字。項氏收藏書畫、古籍中，從未見「構李人」之印，即使真有，也不可能刻意模仿真印的「構李」二字。真正的篆刻家，就算完全一樣的字句，都要力求變化，絕不可能不完全一樣的字句，反而刻意把相同的字刻得一模一樣的。



圖C：「墨林祕玩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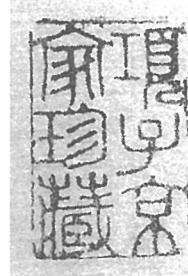


圖D

第二印「墨林秘玩」。圖C是從台北故宮收藏的趙孟頫〈鵠華秋色〉上翻拍下來的，此印項氏用的次數極多，此圖上的鈐印是較清楚的一個。細校圖C與圖D，二印水準之高下立判。圖D的「林」字二木之間的下半以及「祕」字示旁上半的二橫中間，都有一短畫相連，顯不合理。或許有人會認為，那多出的短劃是印泥沒沾好漫出的痕跡，但本書全帙共八冊，單數冊的扉頁上都有這三個圖章，重複出現四次的圖章，都有這二處多餘的筆劃，顯然就不能說是印泥造成的。圖B的「構」字，「隹」的右下多出的一點，也在蓋了四次的印章中都出現，情形相同。「祕」字右半的「必」中間的部份由左上往右下拉的那個筆劃，途中有轉折的筆道，偽刻印則完全沒有轉折的意趣；而由右上往左下寫的那一筆，與「必」字最右邊的豎劃本不相連，偽刻印卻連上了。種種跡象都足以說明，圖D是根據圖C偽刻的。



圖E：「項子京家珍藏」



圖F

再來談第三印。圖E的「項子京家珍藏」，大概是項子京用得最頻繁的一個收藏印了，在項氏藏品中，此印出現的頻率非常高，因此也被偽刻得最厲害。圖F即是據圖E仿刻的，但「項」字右下糊成一團，「京」字的「口」與上面的筆劃相連，「珍」字左半玉部的三個橫劃比原印長，「藏」字的「艸」與下部的「臧」相連，「臧」左半的筆劃相連，「戈」的末筆轉折等等，都與原印出入頗大。細較二印，圖E的「項子京」和「家珍藏」平分印面的一半，而圖F的「藏」字顯然越過中線，擠壓了「京」字的空間。

總的來說，《南國賢書》上面蓋的這三個印章，都是根據項氏收藏印偽刻的，而且仿刻的手法極為拙劣。

再從收藏印鈐蓋的位置看，也透露相當的破綻。一般藏書印鈐蓋的地方，最常見的是蓋在卷首第一頁正面，其次是蓋在卷末或卷末背頁空白處，蓋在書的扉頁是極不合常規的。結合粗劣的偽刻印來看，這個作偽者應該是一個非常外行的人。

本書另有陸于郿的二個收藏印，以及「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」的印記。陸于郿不知何人，其藏印亦甚粗劣，但不能定其為偽，作偽者沒有必要找一個並無大名頭的人去造假。偽刻的項氏三印在陸于郿之前或之後無可查證。但這些印記應都在「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」之前。<sup>18</sup>

國家圖書館另藏有《南國賢書》鈔本，始於洪武三年，止於崇禎15年（1370-1642），二百七十二年間，「三歲一試」的考試官、考題及中舉者名單。<sup>19</sup>

<sup>18</sup> 「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」是日本政府將庚子賠款的一部份退還給中國，由日本政府將這筆巨款用於在中國從事文化事業所設立的機構，於1925年10月9日在北京北海靜心齋成立，主要工作是大量搜購圖書，編纂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並撰寫提要。日本戰敗後，國民政府於1945年10月派沈兼士接收這批圖書，並於1946年移交史語所。其中部份圖書運到台灣，其餘的部份原委託北京大學代管，中共建政後，將之撥交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。參考羅琳〈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編纂史紀要〉，《圖書情報工作》，1994年第一期。另參史語所檔案及黃寬重先生〈談《四庫全書》底本的價值——從本所收藏談起〉，91.11.30文物陳列館系列演講。

<sup>19</sup> 抄本《南國賢書》目錄「洪武」下註云：「三年庚戌始開科。上求治甚切，連試三年，繼病科目不得人，癸丑以後，罷科舉者十有一年，至十七年甲子復開科，三歲一試，定以子、卯、午、酉年各直省鄉試，丑、辰、未、戌年會試，著為令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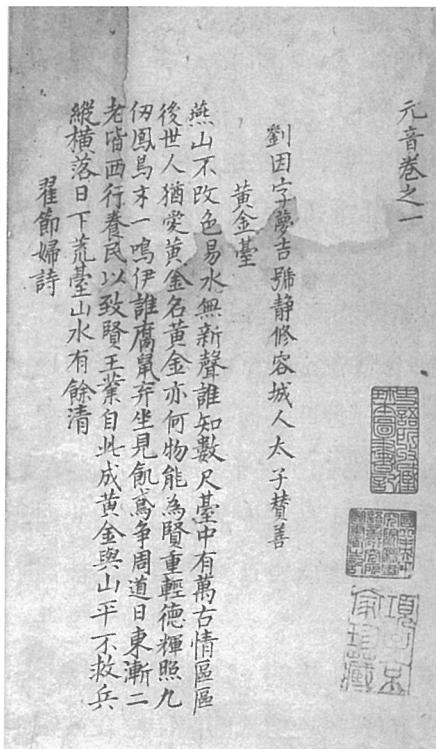
鈔本最前面，有一篇應天府府丞張朝瑞在萬曆26年（1598）寫的〈《南國賢書》序〉。其中提到：

余淮產也，每獲南畿論秀書，輒珍藏之，頃留都多暇，因獵敝篋，得成化甲午迄茲丁酉（1474-1597）賢書若干冊，中有闕者，託許孝廉蒐補之。于是上下百二十餘年文獻，開卷在目，遂撮其姓氏題問，合而梓之學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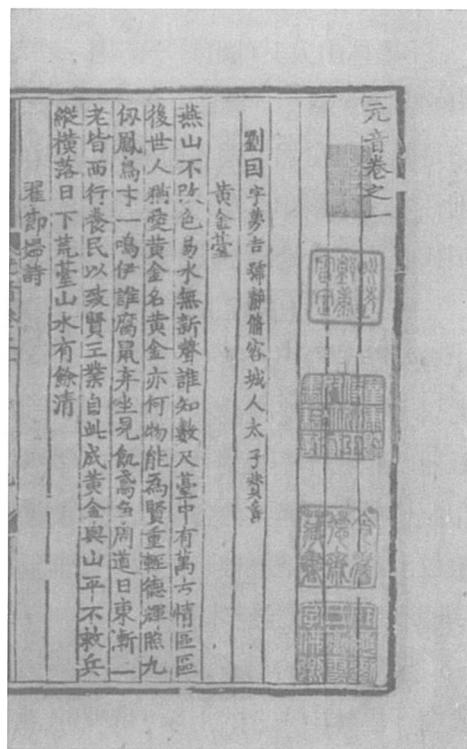
從這段內容看來，這篇序本是為刻本寫的，但現見的刻本卻沒有這篇序，書末則有萬曆28年（1600）徐申寫的〈後序〉，其中偶有轉錄〈序〉的文字。

刻本所橫跨的時間，只有鈔本的中間一段，但內容比鈔本詳盡，主要差別在於試題的詳略。鈔本只有四書題，刻本則詳載第一場考題，除四書外，還有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禮記》的考題。此外，第二場的論、詔誥表、判語，第三場的「策」，都是鈔本沒有的。

#### （四）元音



《元音》鈔本



明建文本《元音》

舊鈔本，12卷，明·孫原理輯。六冊，書高27公分。每頁12行，每行22字。收藏印記除了盧址的「抱經樓」外，還有「項子京家珍藏」（圖G）及「墨林山人」（圖I）二印。這兩個「項氏印」，刻的技巧比上述《南國賢書》的三個偽印高明許多，但仍有一些蛛絲馬跡透露著些許不安。

先看「項子京家珍藏」（圖G），此印刻意模仿，幾可亂真，但仍有破綻，如「家」字「豕」的右側那一筆，真印較直挺（圖E），而圖G則明顯是一個折筆；「藏」字所從的「臣」，中間直畫並不貫通，圖G則幾乎貫穿了。又「藏」字「艸」頭，真印的下部乾淨俐落，圖G則手法尚不嫋熟。



圖G



圖H：「墨林山人」



圖I

「墨林山人」（圖I）一印則手法較高，但細看仍有出入。如「墨」字，向左右撇出的各筆，真印（圖H）圓滑順暢，圖I則顯得生硬。「林」字雙「木」的下半段，真印是圓弧線自然下垂，而圖I則接近直角的折筆。「人」字真印左邊的直筆較直，圖I則往左下方斜出；真印的橫畫筆力圓滑順暢，圖I則頓挫轉折。因此，我認為這兩個項氏收藏印也是靠不住的。

另一個「抱經樓」是盧址的藏書印。盧址是乾隆年間的藏書家，其《抱經樓書目》中有「《元音》，五本」的記載，<sup>②〇</sup>可以證明此鈔本確實曾在抱經樓。值得探討的是：此書十二卷，傳圖藏本每兩卷裝一冊，共六冊，分配十分合理；何以在抱經樓時卻是五冊？經我仔細查對傳圖藏本，發現其第五冊（全書的卷九、卷十）沒有「抱經樓」印記，<sup>②一</sup>字跡與其他各冊相較，明顯的潦草許多。紙張也不像其他各冊那樣有明顯的簾紋。判斷在抱經樓時原缺，此冊係後人補鈔上去的。此書既曾在抱經樓，其抄寫時間即不應晚於乾隆年間。

至於偽刻的項子京收藏印，應該在乾隆年間或更早蓋上去的。此書「抱經樓」印蓋在「墨林山人」的上端，按照收藏印「後來居上」的習慣，項氏的偽印應在被盧址收藏之前蓋上去的。盧址收藏時也許並未察覺到此印不實。

<sup>②〇</sup>見《羅氏雪堂藏書遺珍》第七冊，264頁。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，2001.8。

<sup>②一</sup>也沒有項子京印記。

接著談《元音》的版本問題。聞見所及，《元音》有下列幾種版本。

- 一、傅圖藏舊鈔本。即上面提到的這個本子，六冊，12行22字。
- 二、明惠帝建文三年（1401）張中達校刻本，<sup>22</sup>四冊，12行22字。
- 三、民國八年（1919）武進董康誦芬室影明建文本。四冊，12行22字。
- 四、四庫全書本。
- 五、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本，二冊，10行22字。
- 六、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，二冊，11行21字。
- 七、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孔繼涵家抄本，二冊，10行20或22字。

傅圖的鈔本是個校改本，是分兩階段由不同的人完成的。先是較澀稚的小楷抄了全文，後由另一人用硃筆小楷改動了若干文字，多半的硃色校改已經退色成淡黑色。拿傅圖的鈔本跟其它幾個刻本相勘，可以發現，鈔本中空的字或空的偏旁，在傳世的建文三年刻本中一般也是極為模糊不清而無法辨識的；各版本中，文字或偶有同異，鈔本則與建文本一樣。<sup>23</sup>由此可見，鈔本是根據建文本鈔寫的。

鈔本中的空字或偏旁，由硃筆精美小楷補上，補上的文字與誦芬室影刻本全同；鈔本與建文本同而不同於董刻的「異文」，硃筆也是根據董氏影刻本校改的。校改的小楷遠比原鈔者精美，此人文文化素養應較原鈔者高出許多。有些蟲蛀的地方，其下襯紙裱糊，校改的文字，橫跨原紙與裱紙，可證校改的時間，在原鈔本遭蟲蛀重裱之後，與原鈔本相隔應有一段時日。原鈔本既是根據建文本抄寫，則其抄寫時間自在建文三年之後；<sup>24</sup>而校改者既是根據董氏影刻本，其校改時間亦當在民國八年之後。

董康在影明建文本《元音》的跋中曾說：

此書在明代已多傳鈔，知舊本罕覩。康從友人傅沅叔假全帙，即進呈四庫館底本。四庫全書本與建文本文字大抵相同，董氏所言應可信，而董氏從傅氏借來的本子，有些殘損不可識的字，四庫全書都能補上，也許四庫館所採進的是印得較好的建文刻本。

董氏又說：

至尤難辨識之處，則檢諸家專集選本與明鈔《元音》本互為訂補，無可證者，仍缺之，凡修改三百餘字。

影刻本與建文本不同的地方，當即董氏所修改，如范氏〈張留公母〉（《元音》卷四）「樓閣崢嶸阿母家」，「崢嶸」建文本、四庫本均如是，影刻本改「春深」，鈔本先作「崢嶸」，後改「春深」。此例可證董氏確有修改建文本文字，而鈔本原據建文本鈔，後人又據影刻本校改。

<sup>22</sup>台北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國家圖書館、上海圖書館均藏有這個刻本。

<sup>23</sup>個別文字不一致應是鈔者誤認或筆誤，不是另有所本。

<sup>24</sup>其實際抄寫時間恐遠在此年之後。

## 四、結論

項子京是明末著名大收藏家，因其收藏量多質精，凡有其收藏印記者，往往身價百倍，因此，其收藏印便成為作偽者偽刻以牟利的目標。

傅斯年圖書館收藏的四部鈐有項子京收藏印記的圖書，經本文論述，也雜有偽刻的印記。其版本和印記的具體情況是：

一、《六子全書》：嘉靖年世德堂刊刻本，版本、印記都確無可疑，為項子京天籟閣舊藏。

二、《玉堂類稿》：明鈔本。全書有20卷，此鈔本只鈔其前10卷。遞經項子京及清代、民國諸名家收藏。

三、《南國賢書》：明萬曆廿八年應天府刻本。刻本所包含的時間雖是國家圖書館藏鈔本的一段，但內容比鈔本詳贍。此書的三個項氏收藏印，均屬偽刻。

四、《元音》：鈔本。據明建文刻本鈔成，其抄寫年代應在乾隆年間或更早。此鈔本曾經抱經樓收藏，但其項氏收藏印記也是偽刻的。

### 附記：

本文關於項子京印記的查察，主要得力於傳圖建置的「印記資料庫」。此資料庫為現正進行中之數位典藏計畫的一部份，「本資料庫的建置在於整合傳圖所有典藏之印記，並將傳圖典藏之善本古籍、拓片上原鈐之收藏家、鑑賞者、題識者等印記予以析錄，冀能獲取版本佐證、遞藏經過、印主梗概等，兼及篆刻之文字書法與藝術之美」（傳圖網頁「印記資料庫簡介」），對古籍版本源流與藏書家之研究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如果沒有這個資料庫，在浩如煙海的古籍收藏中，要找出有關的印記，根本是無法想像的事。古籍中無可避免的會雜有偽刻印記，而作為著錄性質的資料庫，如實的記錄實際情況，以提供研究的素材，反而是一種務實的做法。